

伯尔文集

小丑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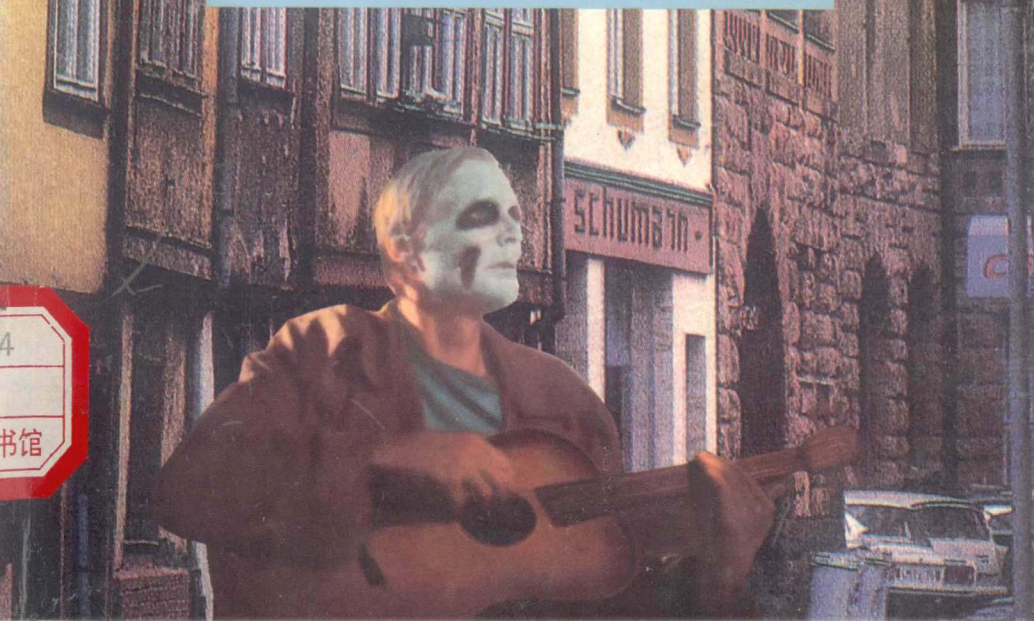
ANSICHTEN EINES CLOWNS

高年生 张烈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4

书店



464502



伯尔文集

小丑之见

高年生 张烈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464502



Heinrich Böll
ANSICHTEN EINES CLOWNS

本书根据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Heinrich Böll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4) 译出
中文版权由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提供



小丑之见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高年生 张烈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327-1758-5/I·1052
定价：14.40元

关于伯尔的《小丑之见》

长篇小说《小丑之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代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一部代表作。小说最初在《南德意志报》连载时就已经产生不同寻常的反响，曾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出版后更是不胫而走，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印数已超过一百万册，成为伯尔全部作品中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世界上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还被搬上舞台和银幕。一九七二年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主要起作用的据说就是《小丑之见》和《和一个妇女的合影》^①这两部长篇小说。

德国文学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严重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段时期黯然无光，直至伯尔、格拉斯、恩岑斯贝格、霍赫胡特、瓦尔泽等人的作品相继问世后，才重新在世界文学中赢得重要的地位。在战后崛起的新一代作家中，伯尔脱颖而出，被一致公认为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性作家。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因里希·伯尔出生在科隆一个雕刻匠家庭。他中学时代就曾经试写过小说，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店学徒，一九三九年进入科隆大学攻读德国语言文学，不久应征入伍，主要在东战场度过了六年戎马生涯，战争临近结束时被美军俘虏，在法国的战俘营里待了几个月。战后他回到科隆，继续攻读德国语言文学，当过木匠和统计员，从一九四七年起开始发表作品，其后便成为专业作家。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

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文学客座讲师，七十年代初曾任伦敦国际笔会主席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笔会主席。三十多年来，伯尔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主要是小说，还翻译过英国、爱尔兰和荷兰的文学作品。一九七二年，他因“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九七七年，西德曾隆重举行伯尔六十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周年的双庆活动，并出版了他的全集。

伯尔的早期作品，主要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战争和士兵生活的描写，揭露和批判了法西斯的战争罪行。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火车正点》(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者，请来斯巴……》(1950)和长篇小说《亚当，你在哪里?》(1951)。从五十年代起，伯尔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不再集中全力描写战争和死亡。这个时期西德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战争影响逐渐淡薄，但战争遗留的种种问题还在影响人们的生活，新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伯尔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西德“经济奇迹”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痛苦处境的同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这一类作品有长篇小说《一声不吭》(1953)、《无主之家》(1954)等。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围绕着一座修道院的修建、炸毁和重建，叙述了莱茵地区一个建筑世家三代人的不同经历，在一天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角色的回忆，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小丑之见》，标志着伯尔创作的新的巅峰。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和一个妇女的合影》和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也都是伯尔的著名代表作品。

① 中译本书名为《莱尼和他们》，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伯尔一贯主张作家应积极干预生活，发挥自己应有的政治作用。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在一篇关于废墟文学的文章中提出他的文学主张：他要影响同时代人，教育人，要象狄更斯那样为改变现实生活作出贡献。他反对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几十年来，他始终本着这一精神，运用他的生花妙笔，针砭时弊，暴露黑暗，批判现状，创作了不少重要的作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认识也在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不断加强，情绪也日趋激愤。可以说，伯尔发扬了批判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用新颖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人们的苦闷、彷徨、愤怒和对未来的憧憬。诚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无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的根源，提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仅仅在抽象的道德伦理范畴或某些局部的改革中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他的思想武器，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

伯尔的艺术手法，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同时也采用了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他的作品摆脱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故事性束缚，不是单纯地通过情节和场景来塑造人物形象，而是采用看起来似乎不真实并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中心事件，直接表现人物的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他有时借用意识流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人的小说技巧，如情节时序颠倒错乱，叙述角度变动频繁，简洁畅快的时间跳跃，强烈逼真的心理描写。他擅长运用回忆、联想、内心独白、象征等手法。有人说他在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当代德国文学界的歌德。

诚然，小说的叙述颠倒穿插得很厉害，有时使读者不易掌

握其脉络，所以要了解作品的故事情节及其思想内容，必须反复阅读，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

在《小丑之见》这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把故事从后面向前倒叙的手法。小说的全部情节发生在一个晚上约三个小时的时间内。伯尔用他一向擅长的讽刺手法，以辛辣尖锐的笔调，透过一个小丑的眼光来描绘当代西德的社会生活，特别对阿登纳时代的政治宗教势力沆瀣一气、旧的纳粹分子重新得势、教会上层人士的腐败堕落和陈腐虚伪的道德观念进行猛烈抨击，使这部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达到了他过去从未达到的高度。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汉斯·施尼尔，是波恩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二十七岁，不信任任何宗教。六年前，他不堪忍受资产阶级虚伪庸俗的生活环境，毅然离家出走，当了小丑，同女友玛丽过着不寻常的生活。但是在教会人士和世人的眼里，他们俩的自由结合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非法的，最后爱人玛丽在天主教朋友的怂恿下，竟离他而去，最后他贫病交迫，沦落为丐，在狂欢节到来时一个人坐在波恩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弹着吉他伴唱着讽刺教会的小调。这个结局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深思。

小说里还有不少富于哲理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是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伦理、道德等方面所作的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回味。

高年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我到达波恩时天色已经黑了。我强使自己不要重复五年来风尘仆仆的旅途生活所形成的那一系列机械动作：走进站台地下道，走出站台地下道，放下旅行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车票，提起旅行袋，交出车票，到报摊买几份晚报，走出车站，叫一辆出租汽车。五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离开一个地方，到达一个地方，早上我在车站台阶上奔上奔下，下午也这样，叫出租汽车，从上衣口袋里掏钱给司机，到报摊买几份晚报，一面在我内心的一隅玩味着这些非常熟练而漫不经心的机械动作。自从玛丽离我去嫁给齐普纳那个天主教徒以后，这一套动作变得更刻板了，但仍保持着那种漫不经心的味道。从火车站到旅馆，从旅馆到火车站，其距离可以用一样东西来衡量，那就是汽车计费表。离火车站是两马克、三马克或四个半马克不等。自从玛丽走后，我有时颠三倒四，把旅馆与车站相混淆，不是在旅馆门房旁紧张地寻找我的火车票，就是在车站剪票口向铁路工作人员询问我的房间号码。某种也许可以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使我回忆起我的职业与境遇。我是一个小丑，正式的职业名称是喜剧演员，无宗教信仰，二十七岁。我有一个节目叫做《到达和出发》，这是一出（几乎太）长的哑剧，观众直到终场也搞不清到底什么是到达，什么是出发。我通常都是在火车上再次推敲这个节目（它有六百多个动作，它们的次序我当然都得牢

记在心)，因此我有时不免会想入非非而不能自己：我匆匆忙忙跑进一家旅馆，寻找列车时刻表，看罢，奔上楼去或跑下楼梯，生怕误了火车，而我其实只要走到我的房间里为演出作好准备就行了。幸而大多数旅馆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五年来，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定了型，难得有什么变化。此外，我的代理人熟悉我的脾气，尽量注意不要出毛病。他所谓的“艺术家敏感的心灵”是备受尊敬的，而且只要我一走进旅馆房间，一种“舒适的气氛”就会弥漫在我四周：漂亮的花瓶里插着鲜花，我刚丢下大衣，把鞋子（我讨厌鞋子）甩到角落里，一位美丽的女侍就给我送来咖啡和白兰地，并给我放好洗澡水，掺上芳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沐浴剂。我躺在浴缸里看报，全都是消遣性的报纸，有时看六份，至少也要看三份，一边还用高低适度的声音唱着歌，不外是些赞美诗、颂神曲、圣歌之类，这些歌还都是我求学时学会的。我的父母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顺从于战后各教派间彼此容忍的风气，把我送进天主教学校就读。我自己并不信教，甚至从不进教堂，我唱赞美诗和颂神曲只是为了治病，这些歌曲最能帮助我排除我生来就有的两种病痛：忧郁症和头痛病。自从玛丽皈依天主教（尽管玛丽本来就是天主教徒，但我还是觉得这样说是恰当的）以后，这两种毛病越加厉害了，甚至连我过去与疼痛作斗争时最爱唱的赞美诗或罗累托连祷曲也都无济于事了。有一种暂时有效的药物：酒；有一个能根治我病的良方，那就是玛丽，但她已离我而去。一个沉湎在酒杯之中的小丑，其堕落之快，较之一个喝醉酒的瓦匠从屋顶上摔下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她喝醉时，我表演的动作就会不准确，而这些动作唯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其准确性，并且我还犯一个小丑最不应

该犯的错误：我嘲笑自己的把戏。这是一种可怕的自暴自弃行为。只要我头脑一清醒，怯场的心情就会与时俱增，一直到上场的那一刹那（通常我都是被人推上台的），而某些批评家所谓的“这种发人深省的批判性欢笑”，“在它的后面有一颗心在剧烈跳动”，只不过是一种绝望的冷漠而已，我就是凭借这种冷漠感情使自己变成一个木偶的；可是，只要牵线一断，我又从木偶变回我自己，那就糟了。修道士们在冥思苦索时大概情况也差不多；玛丽身边总是带着许多神秘玄妙的作品，我记得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空虚”、“虚无”这种字眼。

这三个星期以来，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带着虚假的信心登台，其后果比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接到成绩单时幻想方始破灭那种情形来得更快；半年时间用于梦想是够长的。三星期以后，我住的房间里不再有鲜花了，第二个月的中旬，房子已不带浴室了，到了第三个月月初，火车站到旅馆的距离就是七个马克了，而我的酬金却削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白兰地没有了，只有粮食白酒，我不再在剧场演出了，而是到一些奇怪团体聚会的阴暗大厅里登台表演，那些地方的舞台照明简直糟透了，我甚至不用再作不准确的动作，只是扮几个鬼脸，以取悦那些庆祝自己就职二十五周年纪念的铁路员工、邮政职工、海关官员、天主教家庭妇女或新教护士，还有那些喝着啤酒的联邦国防军军官，我去为他们的毕业典礼助兴，每当我演出“国防会议”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时，他们还总是分不清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昨天，我在波鸿为青年模仿卓别林的动作时滑了一交，当时竟没有能马上爬起来。没有人喝倒彩，只有一片同情的低语声。最后幕布在我头上落下，我连忙一瘸一拐地跑下台去，收拾好我的破烂东西，连妆也不卸，就回住

处去了。到家后我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因为她不肯替我付汽车费。我只好把自己的电动剃须刀交给那个嘟嘟囔囔的出租汽车司机，不是作为抵押，而是顶车费。他倒不错，还找给我一包已拆过封的香烟和两马克现金。我和衣躺到凌乱不堪的床上，把酒瓶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完全摆脱了忧郁和头痛的毛病。我躺在床上，烂醉如泥，犹如倒在臭水沟里——有时我真希望我死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我本来想拿件衬衣去换杯酒喝，只是这种交易需要进行复杂的谈判，才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睡得很香，梦见那沉甸甸的幕布象一块柔软的厚厚的尸布落在我身上，似乎有一种模糊的幸福感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但我在睡梦中就已感觉到害怕清醒的心情：脸上的化妆仍未洗去，右膝肿胀，塑料盘子里盛着一份令人生厌的早餐，咖啡壶旁放着我的代理人发来的一封电报：“科布伦茨和美因茨已取消演出。今晚在波恩电话联系。楚纳勒。”之后，昨晚演出的主办人打电话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基督教某一教育团体的头头。“我是科斯特，”电话里的声音冷淡阿谀兼而有之，“施尼尔先生，我们必须把你的酬金问题再讲清楚。”我说：“请讲吧，没有问题。”

“是吗？”他说。我没作声，他往下说的时候，刚才那种阴冷的语调已变成不折不扣的虐待狂了。“我们曾谈妥付一百马克酬金给一个身价值二百马克的小丑，”——他停顿了一下，大概是想给我一个发火的机会，可是我默不作声，于是他又恢复了他的卑鄙本性，说：“我是一个公益团体的负责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付一百马克给一个付二十马克就已绰绰有余，甚至可以说已经相当优厚的小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中断我的沉默，点燃了一支香烟，又倒了一些蹩脚咖啡，听到他在呼哧呼

哧地喘气。他说：“你还在听我说吗？”我说：“我在听。”我等待着。沉默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学生时代每当我被校长或老师传去训话时总是一言不发。我让科斯特这个基督徒在电话的另一端急得直冒汗；他这种人是不会同情别人的，但自我同情却还是足足有余。最后他喃喃地说：“施尼尔先生，说说你的意见吧。”

“你好好听着，科斯特先生，”我说，“我向你提出如下建议：你叫一辆出租汽车，先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波恩的头等车票——，给我买一瓶烧酒，到旅馆来，替我把房钱连同小费一并结清，再把够我坐一次出租汽车去车站的钱装在信封里给我；此外，你的基督教徒良心还要求你出钱把我的行李运往波恩。行吗？”

他盘算了一阵，清清嗓子说：“可我原来打算给你五十马克的呀。”

“好，”我说，“那你就坐电车来，这样总共也花不了五十马克。行吗？”

他又盘算了一会儿，说：“你不能把行李放在出租汽车上带走吗？”

“不行，”我说，“我受了伤，不能带行李。”显而易见，他那基督徒的良心开始发现了，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施尼尔先生，”他语气温和地说，“很抱歉，我……”“好了，科斯特先生，”我说，“我很高兴能替基督教的事业节省五十四到五十六马克。”我压下电话叉簧，把听筒搁在电话机的旁边。他是那种人，一定还会打电话来胡搅蛮缠的。让他去自说自话，受良心的折磨好了。我感到恶心。我忘记提到，除了忧郁症和头痛病，我还具有另一种近乎神奇的特性：我能在电话里嗅到对方的气

味。科斯特身上散发出一种紫罗兰锭的甜香味。我得起来刷牙，我用剩下的酒嗽了嗽口，费劲地洗掉脸上的铅华，又躺上床去。我想起玛丽，想起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考虑自己的前途。我也想到，有朝一日我将会躺倒在臭水沟里。一个小丑在他行将半百的时候，前途只有两个：臭水沟或宫殿。我不相信宫殿，再说我离五十岁好歹还有二十二年呢。而眼下，科布伦茨和美因茨已取消演出，楚纳勒一定会说这是“一级警报”，不过这倒投合我忘记提到的我的另一特性：懒惰。波恩也有臭水沟，谁规定我一定要等到五十岁呢？我想起玛丽，想起她的声音和她的胸脯、她的手和她的头发，想起她的一举一动和我们一起干的一切。我还想到那个她要与之结婚的齐普纳。我跟他孩提时代就很要好，后来成年相遇时竟不知该用什么称呼了，无论哪一种称呼都会叫我们觉得尴尬，每次见面都摆脱不了这种窘态。我真不明白玛丽为什么偏偏委身于他，也许我从来就不“了解”玛丽。

我在沉思中被人惊醒了，此人偏偏又是科斯特，这真把我惹火了。他象一只狗似的挠着我的房门，说：“施尼尔先生，听我说。你需要医生吗？”“别管我，”我喊道，“把信封从门下塞进来，你就给我走吧。”

他把信封从门下塞进来。我下床拾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波鸿到波恩的二等车票。出租汽车费也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六马克五十芬尼。我原来还指望他会凑成整数，给我十个马克，另外我还盘算好，把头等车票退掉，买一张二等车票，扣除退票费，还可以到手大约五个马克。“都对吗？”他在门外大声问道。“对，”我说，“你这个臭基督徒，快给我滚。”——“请允许我……”他说。我大吼一声：“滚！”片刻沉寂后，我听到他

下楼去了。普通人不仅比信奉上帝的人更聪明，而且也更有
人性，更慷慨大方。为了省下一点钱买酒和香烟，我乘电车去火
车站。老板娘还向我要去我那天晚上给波恩莫尼卡·西夫丝打
电报的费用，因为科斯特不肯付这笔钱。这样一来，再坐出租
汽车去火车站钱就不够了；在我得知科布伦茨取消演出之前，
那封电报就已经发出了，他们比我抢先了一着，这真使我有
点恼火。如果我能先打电报去取消演出，“膝部受伤不能登台”，
我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也好，给莫尼卡的电报至少已经发出
了：“清明日将房子整理好，问好，汉斯。”

在波恩，情况总是迥然不同；我从没有在那里登台演出过，我家就住在那儿，我叫的出租汽车从不将我——应当说：我们，玛丽和我——送到旅馆，而是送到我的住所。这栋房子没有一个可能会被我误认为铁路员工的看门人，可是这所我一年只待上三、四个星期的住所，对我来说，反较任何一家旅馆都陌生。我必须控制自己，不要在波恩火车站外面叫出租汽车：这种动作我已经十分熟练，险些儿叫我下不了台。我口袋里只剩下一个马克。我在车站大门前的台阶上站住，摸了摸钥匙：大门、房门和写字桌的钥匙；自行车的钥匙放在写字桌里。好久以来我就想要演出一出钥匙哑剧：我想用冰制成一大串钥匙，钥匙在演出过程中逐渐融化掉。

我没钱坐出租汽车，而我生平第一次确实需要坐出租汽车，因为我的膝盖肿了。我吃力地一瘸一拐地穿过车站广场，向邮政大街走去；从火车站到我们的住所只要走两分钟，可我觉得好象无穷无尽似的。我靠在一台自动售香烟机上，向那座房子扫了一眼，那里面有我祖父送给我的一套住宅；一套套房间彼此衔接得很别致，阳台颜色显得美观大方；一共有五层，每层的颜色各不相同；我就住在颜色全都是赤褐色的五层楼上。

这是我表演的一个节目吗？钥匙插进大门的锁孔，居然没有融化，打开电梯门，在“五”字上揪一下，一阵嗡嗡声伴随着

我往上升；透过电梯的小窗口可以看见每一层楼的过道，再透过过道的窗户可以看见一座纪念碑的背影、广场、教堂，用泛光灯照明，然后是黑色断面、混凝土块，接着又是纪念碑、广场、教堂，视角略有变化，这样共出现三次，第四次就只剩下广场和教堂了。把钥匙插进前门的锁孔里，毫不惊奇地看到门也开了。

我住所的一切——房门、楼面、壁橱——都是赤褐色的；一个身穿赤褐色晨服的女人坐在黑色长沙发上一定会显得极其般配。也许我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只不过：我不仅有忧郁、头痛、怠惰等毛病，还有在电话中嗅到气味的的神奇本领，而我最可怕的苦恼乃是我对一生一婚制的执著；我只能跟一个女人做男人跟女人所做的事，那女人就是玛丽。自从她离我而去之后，我过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只不过我并非修道士。我曾考虑过要不要到乡下去请教母校的一位神父，可是这些家伙都认为人是多配偶的生物（因此他们极力维护一夫一妻制），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个怪人，他们的忠告不外乎是拐弯抹角地向你暗示，有些地方爱情是可以用钱买的。对于新教徒干出使人意料不到的事情，我在思想上还是有所准备的，比如科斯特，他确实使我感到吃惊。可是天主教徒呢，我已是见怪不怪了。从前我对天主教抱有很大的好感，甚至当四年前玛丽第一次带我去参加那个“进步天主教联谊会”聚会时依然如此；那时，玛丽急于向我引见一些有才智的天主教徒，当然，她内心期望我有一天会皈依天主教（所有天主教徒内心都有这种想法）。在那个圈子里呆上一会儿就使人感到可怕。为了要当一个小丑，那个时期我正在进行非常艰苦的学习。我还不满二十二岁，一天到晚练功。我曾非常盼望那个晚上的到来，我终日练功累得要命，很想有一次快乐的聚会，有许多美酒佳肴，也许还可以跳跳舞

(那时我们很穷,买不起酒和好吃的食物);结果事与愿违,那天晚上的酒很差劲,当时的情景在我看来好象是一位索然无味的教授主持的一次社会问题讨论会。不仅叫人感到无聊乏味,而且完全是没有必要、不自然的。他们先在一起作祷告,这段时间我简直是手足无措;我想他们不该叫一个不信教的人处于这种境地。他们也并非简单地吟诵“天父”或“万福,玛利亚”(这就会叫人够难受的了,我是在一个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的,听够了各种各样的个人祷告),不是的,先是念一篇由金克尔执笔的纲领性祷章,如“求你赐给我们能对传统事物和进步事物一视同仁的力量”等等,然后才转到“当晚的主题”,讨论“当今社会的贫困问题”。那是我一生中最尴尬的一晚。我简直无法相信宗教讨论会那么无聊。我知道:信奉这种宗教是困难的。肉身的复活和永生。玛丽常给我念《圣经》中的这些内容。相信这一切一定是很难的。后来,我甚至还读过基尔克格^①的作品(这对一个未来的小丑是很有用的读物),虽然不太好懂,但读起来并不枯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依照毕加索^②或克莱^③的图画绣桌布。但我觉得,那天晚上这些进步的天主教徒好象都在忙于用托马斯·阿奎那^④、方济各^⑤、博纳文图拉^⑥和利奥十三世^⑦来为自己编织

① 基尔克格(Kierkegaard, 1813—1855), 丹麦哲学家。]

② 毕加索(Picasso, 1881—1973), 西班牙画家。

③ 克莱(Klee, 1879—1940), 德国抽象派画家。

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o, 1225—1274), 意大利神学家、经院派哲学家。

⑤ 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 1182—1226), 天主教方济各会(亦译法兰西斯派)的创始人。

⑥ 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 1221—1274), 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 方济各会的首领之一。

⑦ 利奥十三世(1878—1903), 罗马教皇, 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教义、教会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文章。